

青海历代修志考

陈 超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除汉族外，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如藏、蒙、土、回、撒拉族等，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加之，迟至1929年方建省，因而地方志的纂修事业发展也较为迟缓，早期纂修的地方志，散失的多，完整保存下来的少，特别是在青海境内保存的较少，多散藏在省外各大藏书单位。为了使学术界方便研究青海的历史，有必要对青海在清及清以前的修志活动，民国的修志活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修志活动进行探讨。

一

青海省开始纂修地方志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明嘉靖间的《西宁卫志》和万历间的《西宁卫志》，是青海省最早纂修的地方志。

《西宁卫志》，系由西宁邑人、贡生张芝所纂，可惜早佚。现在仅能从清乾隆间修《西宁府新志·献征志·人物目》的记载中知道张芝曾编纂过这部地方志。青海省的第二部古地方志是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由西宁卫兵备副使刘敏宽和同知龙膺纂修，万历二十四年纂成的《西宁卫志》。据《西宁府新志》记载，该志已无全本，修新府志时仅存有“宦迹”及“艺文”数卷。近年青海省民族委员会古籍办公室整理出版有万历《西宁卫志》辑本，辑者在序言中谓：“此卫志只详边防兵备，不同于一般方

志。”

清代中央加强了青海省地域的行政管理，改明西宁卫为西宁府，建立了西宁、碾伯、大通三县和巴燕戎格、丹噶尔、循化、贵德四厅，悉归西宁府治理（清道光时，循化厅归西宁管辖，以前由临洮及兰州府管辖）。在西宁还设置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青海办事大臣，归中央理藩院直属，治理除果洛以外的青海牧业地区少数民族。当时果洛尚归四川省管辖。在此时间，青海地域的政治较稳定，农牧业生产有所发展，给纂修地方志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同时，清政府又诏令全国各地方政府，定期纂修地方志，也是青海地方志发展较好的原因。这一时期，青海先后纂修了《西宁志》（又称《西镇志》）、《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循化厅志》、《丹噶尔厅志》、《碾伯所志》、《大通县草志》、《采录大通县乘佚稿》等八部地方志。这些地方志大多编辑水平较高，内容也比较丰富真实，而且大多数还完整地保存下来，是青海省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青海省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地方志是《西宁志》，该志书口上刊有“西镇志”三字，故又名《西镇志》。斯志由苏铕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开始纂修，顺治十四年修成刻版印行。苏铕，直隶河间府交河（今河北省交河县）人，时以陕西布政司右参议任西宁兵备道。他鉴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所修的《西宁卫志》已相隔近60年，理应将改朝换代的事实和清朝西宁卫发生的重要变化记载在新的卫志上，于是纂修了这部地方志。

《西宁志》，卷首有西宁卫全图及卫城图，分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艺文等7志。全志约7万字。除有苏铕序外，在艺文考中还有西宁通判张伟绩的《西宁志序》。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文献罕征，故其书亦潦草冗杂，绝无体例，盖创始者难工也”。但对青海省来说，这部地方志的资料是其他史书所不能代替的，它仍然是青海省重要的古地方志。现除

原本存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外，尚有王昱、马忠整理出版的清顺治《西宁志》。

清乾隆十一年（1746），西宁道杨应琚开始编纂《西宁府新志》，次年定稿。应琚，字佩之，号松门，辽海（今辽宁省）汉军正白旗人，进士出身，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元年（1736）至十三年两任西宁道。后又历任两广、闽浙、陕甘、云贵总督。于云贵总督任内，因征战失利被逮赐死，《清史稿》有传。平生诗文颇富，有文才，著有《据鞍录》等。杨氏在《西宁府新志》序中阐明修志原因及成志经过，谓：“湟中旧志久佚，而见存者荒谬不雅驯，且大通本系新疆，贵德又属改隶，皆应汇入郡志，……于乾隆丙寅秋握管，至丁卯夏五月，历十一月而脱稿，其为数凡总志十，分目百有五，计两函，四十卷，撰次校对，咸出余一人之手”。《西宁府新志》除有乾隆十二年刻本外，尚有乾隆二十七年补刊本。盖因乾隆二十六年，西宁府下属的大通卫、贵德所改设大通县和西宁县丞，行政建制有了变化，所以陕西分巡抚治西宁道刘宏绪于次年将有关变化的材料增补刊刻后，重行印刷新本，并在卷首刊有刘宏绪于乾隆二十七年夏五月所作《大通卫改大通县，贵德所改西宁县丞序》。《西宁府新志》是青海省现存旧地方志中部头最大，内容最丰富，编写最得法的一部志书，虽为府志，但收集材料的范围超越了西宁府属的行政区域，对青海省一些牧区和西藏的情况也有涉及。如有关青海牧业区和西藏的部分资料附于武备志内，涉及牧业区的“番民户口”、“茶马”、“盐法”等载于田赋志内，连不属西宁府的“青海办事大臣”也列入官师志中。在青海省未编有旧省志的情况下，这部地方志对青海地方问题的研究价值更显得重要。民国期间张维在《陇右方志录》一书中赞道，“中州之士，游仕于陇者，则徐鸿仪志兰州，杨应琚志西宁，……皆其良也”。又谓杨志“整严有法，而议论驰骤，高瞻远瞩，多经世之言”，对杨志赞誉备至，

由此可知,《西宁府新志》的价值。全志分为10志,志后列子目105个,有些子目还附有小类。首卷列舆图10幅。10志为星野志、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田赋志、武备志、官师志、献征志、纲领志、艺文志。全志约30余万字。

清光绪三年(1877),邓承伟任西宁知府,鉴于此时离杨志印行已有百余年,亟需纂修续志,遂于光绪八年,由邓发起,会同青海办事大臣豫师、前任西宁道张宗翰及西宁邑人来维礼等设局修志,两年修成《西宁府续志》,但未刊印。该志起例发凡,立纲分目,悉遵循杨志体例,星野一志,以已见旧志,不复再续,因而共为9卷。是志对丹噶尔、循化两厅记载较详,记事自乾隆十三年(1784)至光绪四年,对同治年间的史事纪叙尤详,有参考价值,约13万字。此志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基生兰增补,次年青海省印刷局排版印行,细节见后。

清代所纂的两部厅志,计为《循化厅志》和《丹噶尔厅志》(丹噶尔厅即今湟源县),前者为龚景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循化厅同知时纂修,志修成未刊印。景翰,字海峰,又字惟广,福建闽县人,乾隆三十九年进士,归班铨选,乾隆五十七年以平凉知县署任循化厅同知,嘉庆五年(1800)调兰州军充翼长,七年送部引见,卒于京师,《清史稿》有传。景翰工古文辞,著有《邶风说》等。是志是循化厅第一部地方志,龚氏根据有关史书和厅卷纂修成志书,考订准确,体例严谨,文字流畅,有首创循化地方志功绩。民国时,张维在《陇右方志录》中认为龚氏所修《循化厅志》与杨应琚所修《西宁府新志》同是甘肃省(当时青海省尚未建立,循化厅属甘肃省管辖)少有的几部好地方志。志书分8卷,有子目29个,计卷一为建置沿革、分野、形胜、疆域;卷二为山川、古迹、关津、城池;卷三为营汛、兵粮、官署、仓廩、学校、义学、驿站;卷四为族寨工屯;卷五为官师、土司;卷六为祠庙、寺院、人物;卷七为水利、农桑、盐法、茶

法、经费、风俗、物产；卷八为灾情、回变。卷首附舆图5幅。志书约13万字。嘉庆年间，由闽省金台人李本源校后改名《循化志》，刻板印行。道光年间又经人增补，再次刊刻问世。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抄本发行，1981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铅印清嘉庆刻本发行。

《丹噶尔厅志》是清代青海的第二部厅志。早在光绪三年（1877），西宁道张宗翰筹备纂修《西宁府续志》时，派西宁孝廉张于福、明经郭振新到丹噶尔厅，会同乡绅采记地方文献，编成《丹噶尔厅乡土志稿》带回西宁，草稿留在丹邑明经王炬南家，以后时局多变，草稿大部分遗失。光绪三十一年（1905）甘肃省颁布部檄《乡土志例》，令省属各地编纂乡土志。新任厅同知邓尔康经邑人靳学书推荐，邀杨治平纂乡土志。杨氏按《乡土志例》的要求，参考了存放在王炬南处的《丹噶尔厅乡土志》残稿，补充材料，于当年完成《丹邑新志稿》。光绪三十二年，同知张庭武来邑，次年甘肃通志局又通令索取志书，原《丹邑新志稿》的条目又与新颁的通志条目吻合，张庭武复邀杨治平主纂《丹噶尔厅志》，杨氏遂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纂成。后经同知张庭武、文涛、孚慧先后审定，由孚慧题写志名，于宣统二年（1910）铅印出版。全志约12万字，类目凡27，即历史、政绩录、兵事、选举、耆旧、列女、地理、森林、户口、水利、贡赋、动物植物、矿物、商务、实业、风俗、宗教、山脉、水源、道路、险隘、古迹、人类、艺文、义勇、杂纪。有张庭武《丹噶尔创修新志叙》及王炬南等人的序跋。杨治平，字景升，原籍陕西，籍贯丹邑，号痴屏，晚号潜园老人，光绪三十三年考取保送礼部，授岁贡生，平生诗文颇富，著有《痴屏随笔》、《潜园笔记》等64种。因志书如实记载了青海盐池及盐业情况，宣统二年，丹城人王大、张曼巴及李旺等人谓其把本地利源外泄，夺去盐业生计，遂纠集200余名暴徒捣毁其住宅。这是一件因编纂地方志而惹来

的横祸。该志文字通顺，记载翔实，是青海不可多得的一部好方志。

清代纂修的所志为《碾伯所志》（碾伯即今青海省乐都县），由李天祥纂集，梁景岱鉴定。天祥，山东临番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至五十年任碾伯千总，此志成于此时，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景岱于康熙三十九年至五十年任西宁卫儒学教授，受天祥之聘，鉴定所志。是志记事起自周秦，止于康熙十三年（1674），无序跋和例言，约万余字。志分32目，沿革目介绍碾伯自周迄清康熙设置军政机构的沿革；选举目对明成化以来所境内的进士、武进士、举人介绍较详。这是青海其他县志少有的记载。由此可以窥知乐都县是古代青海各县中文化教育较发达的县。其他如所城、古迹、冢墓、市集、山岭、峡谷、川流、池泉、土司、番族、习尚、土宜、赋税、寺观等均有记载。该志是青海省县志中编纂时间最早者，其资料甚为珍贵。志书仅为稿本，未刊。

清道光六年（1826）问晷撰成《大通县草志》，抄本。问晷字惺斋，草志早佚，仅存问晷所写《大通县草志叙》一文附于民国刘运新、廖篪苏纂修的《大通县志》的“艺文志”中。问晷在《大通县草志叙》介绍“草志”编纂的经过说：“大通自雍正三年（1725）设卫，乾隆二十六年（1761）改县，原无志乘，道光六年（1826）晷司训是邑，欲为创修，乃以枵腹孤掌，难卜成功。旋于课士勤咨之下，得西宁府志，披而阅之，有大通卫分载于其中，采集旧闻，备得建县之所由始，因得作此一卷备为实录。凡于立论寓意，无取于文，盖以羌番边徼之地，得承皇清列圣之恩，衣冠文物，渐与华同，不可不辨也。……惟于山川人物，略为表著，凡以俾入斯邑而阅斯志者，远近皆知其略。”由是观之，该草志虽有问晷就地征集资料，但主要是摘抄自《西宁府新志》中有关大通县的材料编纂而成。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梅汝调撰成《采录大通县乘佚

稿》，计28目，现存有抄本及油印本。梅氏通经史，有传世律诗稿载《陇右校士录》。志中主要记载道光至光绪年间大通县的政治、经济、教育各领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对风俗、古迹、祥异亦略有记载。笔者认为，《采录大通县乘佚稿》必与问晷撰《大通县草志》有密切关系，很可能梅氏是整理问晷《大通县草志》佚篇而成。尚祈方志专家研究判明。

在清末宣统年间，康敷熔撰有类似地方志的史书《青海志》，又名《青海记》四卷。敷熔，任过甘肃省安定县（今定西县）知县。全志1万4千余字，抄本，无序跋及例言。内容有蒙古名称、番族种族、住址所在、户口、畜牧、矿产、垦地、森林、出产、名山、水源、路程、寺院、名酋、古迹、气候、方域及蒙番强弱等目。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据抄本影印出版。与《青海志》内容相仿的尚有《青海调查事项》、《青海记》、《青海地志略》三卷，附喀尔喀地志略一卷及厄鲁特地志略一卷。以上各书均为康氏所著。

青海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在藏族典籍中也有不少重要的地方史志。清乾隆年间，有松巴堪布·益希环觉撰的《青海史》，清智观巴撰的《安多政教史》，清阿芒撰的《汉、蒙、藏史》等。寺庙史之属有清乾隆年间佑宁寺土观呼图克图二世曲结嘉措撰的《塔尔寺志》、清光绪年间塔尔寺赛多呼图克图六世洛桑曲称嘉措撰的《塔尔寺续志》、清三世土观呼图克图撰的《佑宁寺志》、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世却藏呼图克图阿旺图旦旺撰的《夏琼寺志》、清洛桑格登撰的《郭玛尔寺志》、清久美特却撰的《隆务寺志》等。河渠志之属，有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潘昂霄撰的《河源记》一卷。潘昂霄，翰林院学士。是记叙述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都实任招讨使至青海的星宿海寻找河源的事。都实对黄河上源了解较为详细，但误以星宿海为黄河源。昂霄据都实弟阔阔出所言，撰成此书。其后朱思本又从八

里吉思家得梵文图书，和此书略有差异。《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即全录此书，而以朱思本译文不同处注于有关文句之下。边防志之属，有宋李远撰《青唐录》。北宋元符二年（1099），王瞻率军攻占青唐城，李远随军到青唐，并撰成《青唐录》，惜已散佚。青唐城宋改为鄯州，即今西宁。

二

民国十八年（1929）青海建省，民国二十五年初，成立了以地方人士基生兰等主持的青海省志略筹备委员会。但编纂工作始终未能开展。民国二十五年五月，青海省志略筹备委员会改组，改称青海省志略馆，设馆长1人，总纂1人，编纂8人。总纂由馆长兼任，推定基生兰为馆长，贾思复、方立业、赵应瑞、邵鸿思、余人、刘绳武、韩树森、李德渊8人为编纂。时过10年，又于民国三十五年，在青海省政府第292次委员会议上，再次提出筹备青海省志略馆的临时动议，会议议决由省政府秘书长马骥负责，魏惠庵、魏南芳、姚钧、韩起功等人组成专门机构，拨发专款，并要求四十集团军中参予编纂志书的人员，也参加志略馆的筹备工作。民国三十六年三月，省政府召开293次会议，通过青海省通志编纂委员会筹备处报呈的该会组织规程草案，并依据其组织规程草案第三条规定，聘请马步芳、马骥、马绍武、冶成荣、刘呈德、马骅、马继援、韩起功、谢刚杰、魏惠庵、石殿举共11人为委员，指定马骥为主任委员，主持会务，韩起功为副主任委员，襄理会务。同年青海省通志编纂委员会拟定了《青海省通志编纂委员采访志料须知》及《青海省通志凡例暨目录》。《青海省通志》的目录计分舆地、建置、民族、民政、财赋、教育、军政、交通、外交、经济、职官、选举、人物、金石、艺文、大事记、文征等17志，子目101个。青海省通志编纂委员会通令各县（市）局地方文献委员会按通志体例搜集志料上报，1949年青海省通志

编纂委员会将各地报来的志料整理成《青海省通志稿志料汇编》21种51册，终因青海省解放，修志工作停止。

民国三十四年（1945），西宁、乐都、民和、湟源、化隆、贵德、大通、互助、同仁、共和、同德11县奉省政府通令，成立了县文献委员会。民国三十五年，各县分别对县文献委员会机构进行调整。各县文献委员会成员大多由当地有关机关的首脑和地方士绅组成。海晏县于民国三十六年，湟中、循化县于民国三十七年也相继成立县文献委员会。各县文献委员会成立后，着手订定县志凡例、目录，并征集资料，开始从事编纂县志。

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省民政厅向省府295次委员会提出咨请各县宽筹文献委员会经费，以资编纂县志的提案。提案中提出的理由是“查县志为地方史乘，本省各县有县志者十无二、三，以致地方文物先贤史迹湮没殆尽，殊觉可惜。”为此，提请大会建议省府转饬各县文献委员会编纂县志，以光史乘，而励来兹。并在提案中提出三条办法：1、由省府转饬各县文献委员会编纂县志；2、由省府指拨专款或宽筹办公经费；3、延聘人力，提前采访，尅期完成。省政府委员会决议原案通过，经费由财政厅列入重编预算之中，并由民政厅组织实施。这次各县纂修县志活动，终因形势、经费所限，了无成果。

民国期间虽然未能修成《青海省通志》，但修订补充并出版了清代邓承伟原纂的《西宁府续志》，大通、贵德两县县志编成，风土调查记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另外，周希武编著的《玉树调查记》，又为后人将其改为《玉树县志稿》，是为青海省牧业区有县志的开端，因此，民国期间青海修志工作仍然取得一定的成绩。

民国《西宁府续志》十卷，清光绪邓承伟原纂，基生兰等补纂。基生兰，西宁人，著有《敬业草堂嚼蜡吟》。民国二十五年（1936），青海省政府代主席马步芳延聘基生兰等补纂《西宁府

续志》，基生兰等遂将清代邓承伟原纂的《西宁府续志》第二至第十卷依次改为第一至第九卷，删去邓志的第一卷舆图，另将自邓志记事的下限起至青海建省日止五十年内的史事纂编为《志余》1卷，作为第十卷，总共仍为十卷。“志余”约5万字，其体例结构仍多仿杨应琚《西宁府新志》的成规，内容着重纪录了民国成立后青海建省前的重要变化。如青海办事大臣公署改名青海长官公署，后公署裁撤改设青海蒙番宣慰使，西宁兵备道改为西宁道尹，后又改设西宁区行政长官，裁厅改县，在牧业区设理事等等，莫不尽录。然而“志余”出自多人之手，又受政治势力影响，偏袒曲迁，较杨志差之远矣。有民国二十六年（1937）青海印刷厂铅印本。198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时，由李文实校点并序，对其得失，论之甚详。

民国六年（1917），由刘运新倡修，廖篪苏编纂的《大通县志》六卷，于民国八年修完。刘运新，安徽合肥人，时任大通县知事，廖篪苏，湖南湘潭人，为留甘肃省的任用县知事。是志记事起于清雍正三年（1725），止于民国八年，约15万字。内容分9志，45目，对大通的沿革、物产、泉水、名胜记载甚详，但当时人谓，此志将八景列于首卷，有失县志形制。民国八年，由甘肃省政报局铅印出版。早在《大通县志》出版前，大通县已先后编有两部大通县志稿，《大通县志》是在这两部志稿的基础上纂修的。《大通县志》的凡例中说：“前训导惺斋问县，增生梅氏汝调，先后制有草册各一部，然非完本。”问县是在道光六年（1826）编纂的《大通县草志》，现已佚，但在修《大通县志》时还存于世。我们现在还可以从《大通县志·艺文志》中看到问县撰写的《大通县草志叙》。他在草志叙中介绍了编纂这部草志的原因和过程。另一部志稿名为《采录大通县乘帙稿》，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虽不著撰人姓名，无序跋，但一般都认为是《大通县志》凡例中所指梅汝调编纂的。《采录大通县乘帙稿》不分

卷，计分28目，现存有抄本和油印本。

民国《贵德县志稿》，四卷，姚钧修，赵廷选纂。姚钧，字衡甫，甘肃天水人，民国十八年（1929）任贵德县长，后升任青海省民政厅长。廷选，字万卿，乐都县人，长居贵德，为清贡生。斯志民国十九年修成，有姚钧《创修贵德县志序》，尚有未署名的《贵德县邑乘序》。全志约6万字，稿本，未刻印。此志是贵德县最早纂修的地方志。内容分为天文、地理、人事、艺文4部，每部各自成册，四部下列目44个。此志的分类体例很特别，不符合中国传统旧方志的分类体例，且各部内容颠倒错漏之处甚多，为时人所诟病。因此，姚钧当年又在《贵德县志稿》的基础上纂成了另一部方志，即《贵德县简志》，仍分四卷，但摒弃了《贵德县志稿》天、地、人、文4部分类方法，改为19个大类41个小类，又删去志稿中的星野、步天歌、时令和方舆测绘图，增加姚钧撰《浇河郡考》，并对志稿错误处略有改正。全志约5万字，仍为稿本，未付印。现已有印本。

《玉树调查记》二卷，附宁海纪行一卷，此调查记又名《玉树县志稿》，周希武纂。希武，字子扬，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人，民国初年任西宁县县长，民国十七年七月自西宁赴兰州途中遭青海国民党军队马步青、马步芳部枪杀。民国三年因玉树二十五族藏区与四川藏区划界发生摩擦，北洋政府命甘、川两省派员会勘。周希武随甘肃边关道尹观察查勘界务大员周务学前往玉树，从实地访问考察、测量所得，兼摘引参考《卫藏通志》、《西宁府新志》、《青海记》等文献而写成是书。记事止于民国三年（1914），7万余字。书分10记，即部落记、山脉记、水道记、地形记、政治记、宗教记、风俗记、实业记、掌故记、考证记。附《宁海纪行》。该书是玉树地区最早的地方史专书，参考价值较高，当时主甘肃省政的张广建为该书作序，对该书有较高的评价，谓“尝观有清一代，儒硕踵出，其著书论析西北地理者

甚众，然于青藏则已略，至海南、玉树二十五族私家记载更阙然无之。盖荒落僻远，学人足迹罕至，至者又率不学，不能抉摘稽比，以供当代士夫之考证，滋足憾也。今周君以淹雅之才，躬历绝徼，周諏周度，备述闻见，翔实精核，无单词只字向壁虚造，其用心不可不谓勤乎”。除张序外，尚有林传甲序，周希武自序和例言。封面有姚明辉题签《玉树土司调查记》。有民国九年（1920）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玉树县志稿》内容与《玉树调查记》相同。该志有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抄本。青海省近年还出版有《玉树县志稿》校注本。

各县的风土调查记、风土调查录、风土调查大纲，具有地方志初稿的性质，值得重视。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青海省的大通、乐都、互助、湟源、巴燕（即今化隆县）、民和、门源、贵德、共和、都兰、西宁等县均编纂有这类材料。本文后面将作介绍。

民国期间，以青海或省内某一地域为对象，综合记录其地理、历史、经济、人文资料的史志有20余种之多，大都有近似地方志的参考价值。现择其重要的简要介绍。

《青海图说》，卷端题名《青藏界图说》，章光庭撰，约1万5千字，记事止于民国十年（1921）。此书围绕川、藏、甘、青边界纠纷，以简洁的文字，记叙界址、界线勘绘的起止处、界线的经过、界址的疑义等。并叙述边界地形险要、山脉、河流、种族、村落、商镇、物产及风俗等。

《青海志》，白眉初撰，记事止于民国十四年（1925），约2万1千字。是志全面介绍青海蒙古族、藏族等的风俗、民情、农业、实业、矿业、工艺，特别对柴达木地区的山脉、河流、池泊、沙漠、气候、驿站、市镇、贸易、歇家记叙尤详。有铅印本。

《青海风土记》，杨希尧撰，希尧，字子高，青海循化人，

同盟会会员，民国初，在甘肃法政学堂任教，民国六年十一月，响应孙中山领导的甘肃护法新军起义，事泄失败，被袁世凯下令通缉，于民国七年（1918）隐藏青海佛寺。在此期间，广为调查青海藏族风俗习惯，撰成此书。民国二十一年杨氏任青海省教育厅长。书中对青海藏族的风俗习惯记述颇详，其内容包括藏族的婚姻、养育、衣食、居处、职业、集会、宗教、丧葬、俗尚等。民国二十年由上海新亚细亚书店铅印出版。

《青海志略》，许崇灏撰。崇灏，又名公武。该书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撰成，同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全书约万字。书分11章，资料来源于新亚细亚学会会员黎小苏、丘向鲁、朱允明等到青海省实地考察所写的报告书。主要内容有青海的历史沿革，历代开辟青海的史实，民国间在青海设置的行政机构，青海的地理环境，自然区划，政治区域，经济概况，各族分布，宗教及寺院，人民生活习尚，教育状况，交通路线等。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了经济恢复时期。随着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修志活动创造了条件。1957年国务院邀集有关专家，制定了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规划，把纂修新的地方志列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开创了由中央倡导的全国性纂修新地方志工作。1958年，青海省成立省志编纂委员会，次年3月，由省长袁任远负总责，副省长薛克明、孙君一主持修志的日常工作，从工业、交通、财政、金融、文教卫生、商业外贸等部门抽调干部100余人参加编纂工作，青海省志的编纂工作便正式展开。嗣后，省志编纂委员会曾先后多次派出人员前往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等地搜集、抄录有关资料约300万字。省内也分头进行志料的收集工作。

《青海省志》原设七卷七志。即第一卷地理志，第二卷历代制度志，第三卷经济志，第四卷民族志，第五卷文化教育艺术志，第六卷宗教志，第七卷杂志，附大事年表。后来在编志的过程中将篇目作了适当调整，以《青海历史纪要》作第一卷为“经”，其余各卷为“纬”。青海省志第一卷《青海历史纪要》编纂进展最快，其修订稿于1961年5月铅印。该卷采取“以年系事”，“依事综述”相结合的方法，依史实发生的先后，按事件的内容与性质，每一事件列为一题，合撰成200题，条目分明，易于参考阅读。卷末附有青海历史大事年表、青海地方历代建制沿革表、青海蒙族29旗表、青海地区藏族分布表、西宁府16土司表、青海地区近三百年来主要官吏表。1980年4月青海人民出版社铅印出版，内部发行。全书约37万字。其它各卷完成草稿、初稿的有《经济志·交通卷第四篇铁路》、《教育志》第二、三章《文化艺术志》、《科学技术志》、《民族志》第一至第五章、第八章。正当青海省志编纂工作加快之时，适遇国民经济3年暂时困难时期的到来，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机构被撤销，修志工作也就停止。在纂修省志的期间，西宁市也组织人力纂修《西宁市志》，1962年11月纂成《西宁市志》第一卷西宁历代史纪初稿，油印本。其他各卷未纂成，也因同样原因，撤销修志机构，停止修志工作。

在纂修新的地方志的同时，省内各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也根据国家民委发起的编纂《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要求，成立各州、县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编写组，广泛收集资料，开展编纂工作。在1964年以前先后完成3州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6部，县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5部。它们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概况（初稿）》、《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概况（初稿）》、《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概况（初稿）》、《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概况（初稿）》、《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概

况（初稿）》、《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初稿）》、《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概况（初稿）》、《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概况（初稿）》、《青海河南蒙族自治县概况（初稿）》、《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概况（第六次修订稿）》、《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概况（初稿）》。“概况”图书着重反映了本州、本县的：自然环境、物产资源、民族、人口、语言文字、行政区划；历史概况、社会结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过程；社会主义革命成就；经济建设，包括畜牧业生产、农业和林业的发展、地方工业建设、副业生产、交通、邮电事业、贸易金融和财政事业的成就。这些州、县很少有地方志书，“概况”图书方方面面的内容都可充当本地地方志资料来利用。

八十年代，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青海全省也开展了修纂新地方志的工作。这次编纂地方志的最大特点是新志新修，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以详今略古为原则，重点表现近六十年的青海历史。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在这次编志活动中，动手较早，抓得较紧的修志单位，已经取得修志成果。如《乐都县志初稿》业已出版。互助土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也于1984年7月编纂出版了《互助土族自治县县志》。青海省志和其它县志也在积极编纂中。

与此同时，国家民委召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写工作会议，布置编写任务。其中的一种便是《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现在已编纂完成并正式出版的有：《互助土族自治县概况》、《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概况》、《大通县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海北藏族自治州概况》和《门源回族自治县概况》、《黄南藏族自治州概况》、《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概况》、《海南藏族自治州概况》、《果洛藏族自治州概况》、《玉树藏族自治州概况》、《海西藏族蒙古

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概况》等共12部。这些图书主要内容为各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自然资源、民族分布、历史发展、政权建设、社会变革、经济文化以及名胜古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其中大部分材料与地方志的要求是十分吻合的。

作者工作单位：青海省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袁 俐）

先秦簿戏考

《楚辞·招魂》云：“崑蔽象碁，有六簿些。”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碁，故为六簿也。”《颜氏家训·杂艺篇》云：“古为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箸。”李贤注《后汉书·梁冀传》引《艺经》曰：“弹碁，两人对局，黑白碁各六枚，先列碁相当，更相弹也。其局以石为之。”

先秦的“博”，大概是一种在设有弯曲的行棋之道的棋局上击棋的一种游戏，其中的棋子即叫做“簿”，共十二枚，双方各六枚，走在前面的竖立起来的一个棋子叫做“梟”，也叫做“骁碁”（古代“梟”、“骁”同音，都有“勇猛”之义，所以这里通用），“梟”用来“食鱼”，以期取筹获胜，所以为双方所重，双方都争打对方的梟棋；打倒了对方的梟棋，叫做“杀梟”，于是也就获胜了（犹如今天象棋比赛中夺得对方“将”“帅”则胜）。其余五枚称为“散棋”，不起决定胜负的作用。用来打棋的器具叫做“枰”。在打棋时得先掷骰子（掷采），后代的骰子用琼玉制作，先秦则用竹制，其形状大概为长形，类似筷子，所以叫做“箸”，也类似箭杆，所以又叫做“箭”。

· 张 觉 ·